

筆隨

1



广东人民出版社

隨筆

1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随 笔

第一集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4插页 191,000字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0册

书号10111·1159 定价0.76元

陸軍

丛刊

第一集 目 录

繁荣笔记文学	本刊编者	1
求是居开卷小札	苏晨	6
呵，木棉花开了 铜鼓的丁冬声里 一只 毛乎乎的爪子 历史的镜子		
桥脚碎语	方行	17
桥 话	茅以升	20
在热带原始森林中	石林	27
海岛见闻录	汪参	52
南海奇鱼志	关浪	65
动物随笔	丘德平	70
器物谈往	易水	81
果蔬拉杂谈	江滨	90
榕荫杂记	吴有恒	99
秦良玉和穆桂英 陈白沙作反了 叱石岩 太子亭 黄巢诗的出处 南武帝和南汉皇		

DE79/23

繁荣笔记文学

——《随笔》首集开篇

本刊编者

—

《随笔》匆匆和读者见面了。

这是一个笔记文学丛刊，目前还只能是不定期刊，但间隔也不会多久。

《随笔》专收用文学语言写的笔记、札记、随笔之类，上下三千年，纵横八万里，古今中外，五花八门，力求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健康的知识，有益的启发，欣然的鼓舞。如能做到这样，或可也算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略尽了绵薄之力。

二

我国古代的散文文学，很多是保存在所谓“杂书”之中的，“杂书”之中数量最大的是笔记，所以可说，我国的笔记文学，源远流长。

有道是：“随笔之体肇始魏晋，而宋人最擅胜场。”其实明、清笔记也多脍炙人口之作。总之，历代作家，继往开来，经过漫长岁月的不断聚集，我国笔记文学的积累相当丰富多采。《随笔》愿与广大同好一道，继承和发扬其精华，为推进新的笔记文学的发展多出一把劲。

三

纵观众多古今笔记文学作品，作者往往不首在刻意为文，而多是由于工作、学习、生活中实有所得，确有所会，才提笔随手写来，故为文风格朴实自然，常以“质胜”见长而受到欢迎。因此《随笔》也想寄希望于作者，请多多寄下言之有物，观点鲜明，短小精悍，活泼清新之作，每则几百字、千把两千字足矣，每组五七则、十来则最好，当然单则亦所欢迎。总之，佳作之来，多多益善，可单发，可连载，也可编为《随笔》丛书单行。

四

一个人，从小到大，一个刊物，也绕不过它的幼年期，如现在与读者见面之《随笔》首集。编者把它及早刊行出来，是因为象赛球一样，总得把球大胆开出去才行。刊物好歹和读者见

了面，是丑是妍，是缺鼻子还是少耳朵，人家也才可能有从品评，有可挑拣，从而找出不足，对症下药，鼓励长进，治病救急。

《随笔》衷心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教，帮忙出主意想办法，以求不断改进刊物。

五

《随笔》首集所载《榕荫杂记》，作者吴有恒，这是一位解放战争时期的纵队司令员，现在是专业作家。这一笔记文学作品的篇幅，本来数倍于所载，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罪恶万端的无辜抄家抄散失了！编者深信并可代表广大读者，吁请了解线索的同志协助代为搜寻失稿，以便能够继续连载一些，他日亦可编为《随笔》丛书单行。

六

《蜗庐漫笔》的作者赵仲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蜗庐漫笔》收《语文札记》、《戏曲零谈》、《历史小品》三组，共十数万字。《随笔》先选载部分，其他待总作《随笔》丛书单行。

《文史小语》的作者蒋星煜，即是写过许多笔记文小品的“白甲”和“布谷”，他寄稿时附函编者，说是还有八组文章可继续寄来。

《广东小说家杂话》作者李育中是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他寄稿同时附函编者，表示还要继续为《随笔》源源撰稿。

老作家黄药眠、王西彦稿未到信先到，顺谈了一些对笔记文学的看法，已为刊出。信中表示最近即将有稿寄来，编者切

盼早日兑现。

总之，希望已成集的，再起新的炉灶；已开篇的，加油赶写，早日成集；已答应寄稿来的，一言千金，说到做到。繁荣笔记文学，也需要造成一个气势。

七

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桥话》，是选刊的他十多年前的旧作。编者这一番苦衷，想表达的是渴望自然科学界各方面学有卓成的老专家、老学者也来助以一臂之力，不吝惠稿。编者知道我国自然科学界许多老专家、老学者都在洋洋科学巨撰之外，另有生花妙笔，说来这也是广大非专业读者的一种福气。

《在热带原始森林中》等其他各篇的各位作者，分处在多种工作环境，担负着多种职务分工，这更说明了笔记文学之为文，大家都可来得满方便，所以《随笔》寄极大希望于最广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个最强有力的基石。

八

《求是居开卷小札》之排在稍前，意在提倡笔记文学之为文，也宜至少有一部分毋忘与当前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同呼吸共脉搏。《随笔》首集这类作品较少，是一大不足。

我国当前，简言之，一个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题目，一个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任务，可直接间接为文的天地，堪称广阔之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讨论，还要普及深入，而于此就更是大可为文的了。

《随笔》切盼各方作者积极为它赶撰这方面题材的笔记文学作品！

九

《随笔》开出《古笔记丛萃》一栏，首集刊载了吕叔湘选注的刘义庆《世说新语》二十则、李肇《国史补》十则，均已见《笔记文选读》。此栏以后还要续办下去，热望吕叔老在估摸我们要用完之前，再为《随笔》选注一些新的。

顺此编者还想到，不知哪位愿给《随笔》再开出个《今笔记挹爽》的栏目？把五四以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一段时间里的笔记文学佳品，也来发掘一番，每家取之若干则，略作一点评点，如此连载下去，有今有古，想必是可能更会为大家欢迎。

十

《随笔》的编辑人手，目前总加起来未足一丁，全是三两个人在完成既定编辑任务之余，各抽一些时间加码办起来的。这样就得恳请作者体谅，来稿务必誊写清楚，把引文自己查对准确。千把字三两千字的短稿，未必都退，望自留底稿。其他退稿，也未必提出具体意见。这是不得已而行之者，见恕，见恕！

三月十六日

求是居开卷小札

苏 晨

呵，木棉花开了

呵，木棉花开了！远近一树树，一片片，开得真红火。去年才平反昭雪的已故广州市老市长朱光，调寄《望江南》写了五十首《广州好》，第四十九首是赞美木棉的：

广州好

人道木棉雄

落叶开花飞火凤

参天擎日舞丹龙

三月正春风

广州人很钟爱木棉。你看广东人民出版社印制的年历，这时候正翻在印着岭南画派老画家关山月《羊城春晓》图的一页，那画面上参天擎日的两株木棉，正是飞着火凤、舞着丹龙的。

你到广东省博物馆走走，那里正在举办陈树人国画遗作展览，这位已故的岭南画派更老一辈画家，是以画参天擎日飞火凤舞丹龙的木棉著称的。在广州，木棉的形象到处受到推重，就连东方宾馆那铁栅栏，也是嵌的木棉花图案的结构。

我国古代最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在他撰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说：“广交木棉，树大如抱，其枝似桐，其叶大如胡桃叶。入秋开花，红如山茶花，黄蕊，花片极厚，为房其繁……结实大如拳实，中有白棉，棉中有籽，今人谓之斑枝花，讹为攀枝花。”其实这位细心的老人也把木棉的花期根本弄错了，而且叫攀枝花也不为讹传，在云南木棉就叫攀枝花。我国一个名声赫赫的新兴重工业基地，就建在云南渡口攀枝花地方。

至于李延寿在《南史》中记载的：“林邑诸国出古贝花，中有鹅毳，抽其绪，纺为布。”并以为这“古贝”就是木棉，其说便更靠不住了。木棉科有木棉、吉贝两个属，两者不是一码事，“古贝”也是吉贝的错刊。这书提到吉贝的棉毛能纺纱织布，倒是真的。木棉的棉毛只能作垫、褥、枕头之类的填充料，比不得吉贝。

张勃在《吴录》中记载说：“交州永昌木棉树高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花大如杯，实中棉软白，可为缊絮及毛布者。”这有些含混不清。

《岭南杂记》这部古书说对了木棉“正二月开大红花如山茶”，但是也还没分清木棉和吉贝。这书有个贡献是记载了吉贝布的情况：“海南人织以为巾，上出细字，花卉尤工，乃名曰吉贝，即古所谓白叠布。”只是这书的作者并没亲眼见，说是当时就已经不可见了。谁知道这是否就是我国古代著名女纺织家、从松江乌泥泾来到海南岛的黄道婆的发明呢？

《广西通志》问世，已能明确指出：木棉之“以为吉贝，误之甚矣。”《植物名实图考》只一字排开征引了上述种种资料，任其互相矛盾去。

还是翻翻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主编的《海南植物志》吧，这位已故的华南植物研究所的老学者，也是去年才平反昭雪的。那书中的记载是：木棉、别名红棉，英雄树，攀枝花。落叶大乔木，高达二十五米，花通常红色，有时橙红色，蒴果大，长圆形，木质，花期，春，果期，夏。分布：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省（区）南部。印度、斯里兰卡、中印半岛、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北部。

哎呀，这还得了！新华社广西前线三月五日电，新华社记者阎吾、熊铮彦的战地通讯《铁证如山——河内当局赖不掉的事实》报道：侵占友谊关前浦念岭的越南侵略军，站在我国领土上挥着拳头向我国边防部队嚎叫：“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越南当局竟以木棉生处为其地区霸权主义的扩张目标，这岂不是要生吞我国南方的半壁江山！而且也不止是“大印支联邦”呢。

木棉在我国人民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是英雄树，英雄花遍开的祖国南疆大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神圣领土，看谁敢来染指！新华社三月五日已经奉中国政府之命声明：“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自二月十七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已达到预期目的。”可是中国不要越南一寸领土，“中国政府宣布，自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起，中国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三月九日报载：火红的木棉花正开遍伟大祖国的南疆。英雄树下凯旋归来的英雄将士和边境人民一起，正象那巍峨的英雄树一样，威武而更警惕地严守祖国边疆。

铜鼓的丁冬声里

越南侵略军嚎叫“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这不是哪一个人一时说走了嘴。这是越南当局多年来百般灌输仇华思想的结果。

从我五年前亲身经历过的一件小事，也足以看得出他们灌输仇华思想的无孔不入。

那时候我还在光明日报工作，一天来到中山大学采访，听中文系考古教研室的两位教师谈到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于是我向编辑部发回一篇题为《铜鼓问题及其他》的内部参考资料。

铜鼓这东西，现在是一种精美的文物，我国南方和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却早自两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宝贝它们了。我国的铜鼓，大体有三种型式。一种是云南出土较多的“石寨山式”，它们体态不大，鼓身剖面成起伏显著的胴、腰、足三段，纹饰特点是有一道特别宽广的主晕，鼓面光体角数不等，内饰是具有“滇族”生活特征的舞人、翔鹭、竞舟、牛等写生图案。再一种是广西出土较多的“灵山式”，它们体态巨大，有的重三百多公斤，鼓身剖面也分成胴、腰、足三段，但是起伏幅度较缓，鼓面光体六至十二角不等，纹饰多是几何图案，鼓面有青蛙等立体形体。还有一种是我国南方和西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感兴趣的“麻江式”，它们形体小巧，鼓身只分成胴、足两段，鼓面光体十二角，主晕多饰以由舞人演变来的游旗纹，以及十二生肖，八卦，福、寿、西字等，这是南宋后已有汉族商人参与铸造的。

这些铜鼓从铜釜演化而来，又从一般器物演化成少数民族奴隶主象征权势震慑属民的传家宝器，于是便越铸越精，越传越神。如唐至明代的潯州土司杨氏，南梁时的岭南俚帅陈文彻，

明代四川“都掌蛮”统治者“阿大”，就都是占有大量铜鼓的。据《明史·刘显传》记载，有一次刘显抢下了“阿大”九十三面铜鼓，“阿大”曾伤心痛哭，无限哀叹：“鼓有剥蚀而声响者为上鼓，易牛千头，次者七、八百头。藏至二、三面者，即得潜号为王。始吾出劫，必击鼓高山，诸蛮闻山头鼓发，并云集……劫数胜，皆赖此鼓以为灵。”大概这也就是清人邓显鹤《铜鼓歌》中描绘的：“颇闻蛮中最宝此，千牛一面称雄尊……僚伶仃僮畏‘都老’，获鼓胜获十万军。”

越南当局操纵他们手下某些“所长”“教授”者流，利用铜鼓问题打了不少鬼主意，用来煽动仇华。一九七二年越南考古代表团来到广东省博物馆看铜鼓，就曾当面出言不善。这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稍一了解，原来他们早就在越南大造其舆论了。说什么越南早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就能铸造青铜器，越南青铜文化的典型是东山文化，代表器物是“玉缕铜鼓”，古代骆越人创造的这种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纪才传到中国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的根据之一是《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过马援班师回朝时带了骆越铜鼓。根据之二是“玉缕铜鼓”和同一类型铜鼓都有船形、鸟形和羽人纹饰，而这只有古代从长江下游渡海到现在越南的骆越人才能创造出来，云南、广西人没渡过大海创造不出这种纹饰来。因而只能是从越南传入的。在这个“理论”的掩盖下，便象“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一样，也造出来个“凡是有铜鼓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只可惜这帮东西撒谎也不择个时辰，竟没顾到所谓他们发明铸造青铜器那个文化层至今尚没发现过铜。也不再多看两行《后汉书·马援列传》，那上面不是明明白白写着么，“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马式，还上之。”“马式”是相马的模特儿，马援造的各种名马式“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

寸”，可不得熔掉不少铜鼓！至于说到我国铜鼓分布区域，事实也偏偏不给他们面子，竟是云南、广西之外，广东、湖南、四川、江西都有，这虽然可使他们按照“凡是有铜鼓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这种“理论”把贪婪的口水再流长一截，但是可不利于他们所谓的马援既是从外面带回骆越铜鼓，就不可能在中国南方见过铜鼓这种谬论。而木船和鹭纹铜鼓，在广西也并不是早期类型呢，只不过是中期类型。

我见过不少的铜鼓，也很喜欢那美丽的铜鼓拓片。过去，对那丁丁冬冬的铜鼓声可没有多大兴趣。然而现在也改变了，我希望人们在铜鼓的丁冬声里可千万警惕着呵，有人竟说我国中南、西南数省因为有铜鼓出土便是他们的呢！

一只毛乎乎的爪子

我有一位做象牙雕刻师傅的朋友，她从北京给我寄来一部《中国各少数民族服饰图册》，印得相当精美。我翻看着，不禁想到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正是各个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

诞生我的故乡辽东，古代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我的近亲中如今也不乏少数民族。我现在居住的岭南，古代是著名的“百越”之地。不过现在说来可还是西南的少数民族更多。

对于商、周那样久远的古代聚居在岭南的“百越”部落，《尚书·青誓》、《逸周书·王会》、《诗经·大雅》这些远古文献就已有记载。在中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有提到。如“南夷”、“仓吾”、“南瓿”、“南国”、“南海”这些词儿，指的便都是“百越”部落。他们和商、周王朝经常有交往，有时候也发生战争。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了岭南和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古代的西南，那里聚居的是“西南夷”。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西汉当时的“西南夷”情况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比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牁，名曰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司马迁还记载说，战国时候，楚国将军庄蹻领兵入滇，后来因为秦国占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断了庄蹻的归路，他就带着手下人马在那里当了滇王，把服饰也都改成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样子，一切按当地风俗习惯办。这样一直到汉武帝元封二年，也即是公元前一〇九年，滇王才又归依汉朝中央政府，朝廷正式给他颁了刻着“滇王之印”四个大字的金印。有趣的是这钮金印在相去两千多年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真给云南的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又发掘出来了，正和《史记》的记载相同。自从滇地划入汉王朝的正式管辖范围之后，西南各少数民族和中原的交往就更频繁了。

可是你想得到么，越南当局不但打了木棉和铜鼓的鬼主意，也同样在上面提到这些兄弟民族身上作了不少文章呢。

出场的还是那几个“跳梁”，再加上他们的高鼻子“乃师”。这帮丑类一递一句，硬说什么“东南亚大陆，从历史民族志观点看来，在古代要广阔得多，它包括了现代中国华南的许多省份”；硬说什么“印度尼西亚人与藏缅人在人类学方面之不同点是非常含糊的”；直到干脆一丝不挂的武断宣称中国西南“属于藏缅系种的民族……即是同越南同种的人”；“骆越人以及僚族人……都是同一渊源的远世后裔”；“越南的民族和古代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的居民都是印度尼西亚种”……

咳！我真算佩服越南当局的这种无孔不入精神。只可惜他们

不是在研究人种学，而是为了推行地方霸权主义制造口实。可是，也不好老用后脚跟思考问题呀，人家要反问一句又怎么办？

比如，从民族语言分析来讲，中国的黎族、壮族、傣族等是属于壮语族的民族，并不同于藏缅语族；古代曾居住过长江流域一带的苗族、瑶族又不同于上述两族，而属于苗族语族；至于藏语族中的彝语支和藏语支各民族，他们在古代就生活在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而不是长江流域一带；特别是中国上述各族都属汉藏语系，而印度尼西亚人却属于马来亚——波里尼亚语系，彼此连语系都不同，又怎么可以把中国那么多兄弟民族全说成和越南的民族一样“都是印度尼西亚种”！

在地底下运行的万千年历史风雷是最雄辩的，无奈让我们请广西的“柳江人”也出来作个证吧，这是一具一九五八年在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发现的人类化石，它是广西旧石器文化的代表，也是迄今在我国以至东南亚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的代表，然而他却是个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而不是什么印度尼西亚种。

广东马坝石峡遗址的发掘结果同样无助于那些大人先生。石峡文化的印纹陶，有肩石斧，钺类和亚腰石斧、钺类，平底盘式陶鼎和三足、圈足陶盘……等等，说明的是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与我国中原和其他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云南出土的大量西汉时期兵器、农业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更是无比生动地反映了汉文化那时候就已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还有趣的是不少随葬品竟刻有汉文字，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胜西”印，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李清”印、“黄义”印、“寿之人”吉语章，带劲得很呢……

所以我真诚奉劝越南当局，还是喝杯凉水醒醒神儿好，想在民族问题上插进一只毛乎乎的爪子来，也没门儿！